

孫治方頌

陳雲

光明日報出版社

孙 冶 方 颂

光 明 日 报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永安路106号)

北京新华书店发行 光明日报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3 字数70000
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

统一书号: 3263 009 定价0.32

目 录

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科学院机关委员会

关于授予孙冶方同志模范共产党员的决定

信 念.....	梅 益 (4)
哭冶方.....	冯 定 (10)
雪山上的莲花.....	张天来 (14)
铁肩担正义.....	林玉树 (20)
病房静悄悄.....	金 涛 (24)
新松恨不高千尺.....	王 武 (29)
春风春雨.....	林玉树 (35)
学术讲坛创新风.....	张天来 (40)
理论的力量从何而来?	陈英茂 (44)
为有源头活水来.....	王 武 (48)
珍贵的友谊.....	陈英茂 (53)
致光明日报编辑部的信.....	(60)

我的遗言.....	(61)
病魔夺不去的.....	李 昭 (62)
一盆艳丽的山茶花献给外公.....	沙 沙 (68)
洒向人间多少爱.....	薛禹谷 (73)
我们所认识的冶方同志.....	吴觉农 陈宣昭 (75)
孙冶方和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	冯和法 (78)
革命者的本色.....	鲜金城 (81)
长歌当哭.....	张 扬 (85)
终生难忘的良师.....	张 伦 (88)
小 事.....	李 玮 (89)
他指引我走上研究的路.....	于清波 (90)
孙爷爷和莲莲.....	欧阳杰 (92)

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科学院 机关委员会关于授予孙冶方同志 模范共产党员称号的决定

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科学院机关委员会于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全体会议决定，授予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我院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孙冶方同志以模范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孙冶方同志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四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从十五岁起就从事革命活动，在近六十年时间里，一贯忠于党的事业，严格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他在工业、财贸、统计、党校教育等各条战线上为党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创造性的理论研究方面，为宣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孙冶方同志在经济研究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不唯上，不唯书，一切从实际出发，努力研究和解决我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重大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三十年代，他到农村、工厂进行调查研究，深入分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有力地驳斥了王明和“托派”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谬论，捍卫了党的土地革命路线。四十年代初，他在华中党校工作期间，针对当时存在的经验主义，提出要重视和加强干部理论教育的意见，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赞许，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他在周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肯地分析了我国国民经济

管理体制的弊端和某些经济政策的失误，对国民经济体制的改革提出了许多有真知灼见的主张和建议，比如：提高经济效益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关键，在计划经济中要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要正确运用经济杠杆，提高利润指标在经济管理中的地位；要扩大并适当规定企业经营管理的权限，正确处理国家集中领导和企业独立经营的关系；要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加强对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等等。他对在国内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有广泛影响的唯意志论和自然经济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打倒“四人帮”后，他又积极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不少有价值的新见解，如最近提出的实现战略目标必须重视老企业的技术改造以及基数与速度的关系等意见，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和表扬，赵紫阳总理在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采纳了他提出的主张。他还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体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推进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孙冶方同志以自己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和理论紧密结合实际的良好学风，为我院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树立了榜样。

孙冶方同志坚持无产阶级原则性，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洁性。二十年代，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积极参加和支持党员群众反对王明家长制统治，因此受到迫害。三十年代，他不顾王明宗派集团的排斥，对“托派”违背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言论进行了公开的批判。解放后，孙冶方同志冲破种种传统观念和“左”的思想、政策的束缚，提出了一系列已被近几年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经济观点和改革主张，纵然受到康生等的残酷斗争，但毫不动摇。“文化大革命”中，他又为此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更为严重的迫害，身陷囹圄，依然保持着共产党人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的

品德；并且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反复地为《社会主义经济论》打腹稿。他说：“死不足惜，名声毁了也不要紧，但是我长期从事研究形成的经济学观点决不能丢，我要为真理活下去！”他这种为了坚持真理，不畏反动权势，不顾个人安危，勇于同一切错误作斗争的精神，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铮铮铁骨。粉碎“四人帮”后，他积极参加了理论战线上的拨乱反正的斗争，坚决拥护并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方针政策。

孙冶方同志严于律己，非常重视党性修养。他多次受到错误批判和打击，但从不计较个人恩怨；他有很长的革命斗争经历，但从不计较个人名位；他具有高深的理论修养，深孚众望，但从不摆权威架子；他艰苦朴素，从不搞特殊化。他作风民主，平等待人，纯厚质朴，关心群众疾苦。他虚怀若谷，热情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商榷意见，公开放弃那些自己认为应当纠正的学术观点。他对中青年研究人员的帮助和教育非常重视，在他主持经济研究所工作和其他的理论活动中，为我国经济理论界培养了一批研究人才。他具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坚强的革命意志，近年来虽然年高又身患重病，但仍然十分关心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顾病痛，坚持科研工作，积极向党提出建议。

孙冶方同志是我们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和坚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国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以自己的革命实践和卓越贡献博得了我院党内外广大群众的爱戴和敬仰，并在国内外经济学界享有崇高的声誉。

院机关党委号召全院共产党员和科研工作者，要向孙冶方同志学习，以孙冶方同志为榜样，加强党性锻炼，改进学风，创造性地研究和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为开创社会科学研究新局面，为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信 念

梅 益

二月二十二日上午，孙冶方同志还是清醒的。过午，病情突然恶化，神智昏迷。十五时半，当我们赶到医院的时候，他的瞳孔已经发散了。他闭着眼睛，脸上没有痛苦的表情，只是呼吸微弱而又急促。十七点，当他的外孙在他耳边高叫“外公”的时候，他睁开了一下眼睛，随即又闭上了，同时呼吸也停止了。再过五分钟，心电图上出现的横线表明他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燃烧了七十五年的生命之火终于熄灭了。

亲眼看到又一位饱经风霜、久经考验而又有重大贡献的老战友离开我们的行列，很难不流下眼泪来。对我们党，对正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我国人民，这损失确实是够沉重的。

孙冶方同志首先是一个共产党员，其次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他对祖国、对共产主义信念的坚定不移的忠诚，鼓舞和支持他一生不停地进行战斗，就是在病中也是如此。

一九七九年九月，他在首都医院进行了第一次手术。经过了五个小时，主持开刀的朱玉大夫给我们看了刚从肝区割下来的肿瘤，它大到一只四寸盘子刚好装满它。大夫说，是否扩散还很难说。从此，孙冶方同志就在死神的威胁下度日。人世间最出色的工作往往是在逆境下做出来的。孙冶方同志知道他留在世上的日子屈指可数，思想上的压力和肉体上的痛苦成了他

精神的兴奋剂。他在忘我的劳动和与疾病的顽强斗争中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历程。

在三年五个月间，他进了四次医院和两次疗养院，前后共占了两年多。每次住院他都带了大量的书稿。在进行了第一次手术后两个月，他就要求经济研究所给他几位助手，帮他一起整理他的《社会主义经济论》。他每天上午构思，下午工作，二、三小时过后他已脸色苍白，浑身象散了架一样。我们苦劝他，告诉他治病和疗养是党交给他的主要任务。他总是笑着点点头，但精神一恢复，他又开始工作。对他说来，时间就是生命。他只争朝夕，利用时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规律。

在病中，他的注意力也不限于经济问题。他对我说，“我是文学的门外汉，但我从张光年、阳翰笙同志（他们曾和他一同住院）那里学到不少知识。”他在《文艺报》上发表的两篇文艺评论，就是这期间写出来的。

三年五个月，他写出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续集），整理和起草了《社会主义经济论》、《中国社会性质的若干理论问题》，三本约七十万字。他还写了二十三篇经济论文和上述两篇文艺评论，还有一篇党史资料，其中二十四篇是在病房或疗养所写的。他专门做了一只床桌，使他能坐在病床上写作。他不愿意别人代笔，总是自己写，他说“一个人的文章有他自己的风格。”在死神威胁生命之际，他仍然改不了老习惯。自己动笔，对一个重病的人是很艰难的。去年十二月，他给乔木同志写了一封只有几百个字的信。这信写了两天，而第一天只写了“乔木同志”四个字。

他最后的一篇论文，就是发表在去年十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的那篇经济论文《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经济保证——兼论“基数大，速度低”不是规律》，在十

二大会期间他已经起草了简要的发言稿，并在小组会上谈了。后来又一再琢磨，在要动手写的时候，病情进一步恶化，而文章比较长，时间又紧，因此只好口授，由《经济研究》的副主编张卓元同志代笔，但是不仅文章内容、甚至连段落、标点都要严格按照他的意见写，最后他还要亲自审阅，一遍又一遍。文章见报了，他还感到不足，因为他认为有些意见还没有得到准确的表达。

孙冶方同志很清醒，他知道他留在人世的时间已经不多。重病在身，但是他无所畏惧，反而奋斗不息，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强烈的责任感。只有一件事他感到遗憾。在青岛海滩上，我们一面听着涛声，一面迎着夕阳散步，他说他一直责备自己，没有抓紧时间写完他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现在，这确实是一件大家都感到遗憾的事情。这本书，在秦城的牢房里他是打好了腹稿的，按理是不难完成的。可是出狱后，特别是近几年，祖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变化，一个有强烈责任感的经济学家是不能回避我国经济上惊天动地的成就，用过时的材料来写他的著作的，何况他又是一个年过七旬身患绝症的人，确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赵紫阳同志在看望他的时候和他讨论了这个问题。紫阳同志亲切地向他建议：“为了快一点把这本书写出来，可以由你口授，请别的同志代笔呀。”他笑了笑，感谢领导对他的关怀，接着说：“我就有个坏脾气，总要自己写。”就是这个坏脾气，使他曾为它呕心沥血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终于成为一部没有完成的著作。

孙冶方同志不是一个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才子，更不是眼下常见的那种在别人的文稿上署上自己名字的人。他认真、勤勉、严肃，写文章总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抠。作为一个学者，他一丝不苟，全力以赴，决心让有限的生命迸发出绚丽的

光彩。“不辞呕血酬邦国”，“夺取流光朝又暮”，赵朴初和端木蕻良两位诗人是怀着深深的敬意写出这样的诗句的。

孙冶方同志能够活到今年，这是个奇迹。他战胜疾病的意志坚强到令人惊异的程度。有一位诗人说过：“勇敢的人，子弹见了怕他。”肝癌不是那么轻易地扳倒了孙冶方，只有在他动了大手术三年半之后方才夺走了他的生命。

在去年十二大期间，我们都住在国务院第一招待所。他因为日程紧张，精神亢奋，时常失眠。我劝他少参加小组会，他不听。到了会议后期，他还是勉强支持着。大会结束后，他回家，有一天我去看他，他正在伏案写作，九月初就穿上毛衣还抱着一个热水袋。他说是胃受寒，不舒服。我们一定要他到医院看看。九月九日他一到医院，大夫就立即送他到病房。主治大夫在检查后对我说：“病情很严重，很可能不会出院了。”这是三年来他第四次住院，也是最后一次。他每天很早就起床，在护士进屋以前，他已经叠好被子，整理好房间，连厕所浴室也刷干净，然后带上半导体收音机，绕着院内花圃散步。他天天读报，听广播，晚间还看电视。不久，他不能出门了，躺在床上的时间越来越长了，但是，只要自己还能动，每次上厕所都谢绝别人的搀扶。当他疼痛难熬的时候，他就让亲属放贝多芬的交响乐，特别是《英雄颂》。他紧闭眼睛，谛听悲壮乐章，度过那难捱的时刻。

到了十二月，他已靠输液和输血维持生命了。医院好几次报告说他已病危，随时可能发生意外，最后一次是说他过不了春节。但是每个到医院去探视他病的人都看见他安详地躺着，时常面带笑容，低声谈话，好象病情并不严重。十二月十八日，当我们通知他社会科学院党委已授予他模范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时，他笑着说：“我为党做的工作还很不够，希望把病

治好，多做几年工作。”这是出自肺腑的话，尽管已经病危，但是他仍然强烈地要求活下去，病魔从来没有压服他。

一切可以治疗的处方和药物都已使用过了。腹水已到胸隔膜，下身肿得厉害。每次帮他翻身，就在背上留下指头大小的陷坑。现在只能维持他的生命，让他能看到初春的阳光。有一天晚上，他便血二十多次，还有别的症状，医院认为十分危急，很可能过不了新年。因此第二天，就是十二月七日，我代表组织问他有什么要对我说的话，有什么要我办的事情。他平静地说，“我都想过了。我将亲自把它写出来，交给你。”遗嘱一共三条，但过了两天，他又增加了最后一条。这就是报上公布了的。他还一再叮嘱说，理论上的探讨他同意，宣传他个人的事情他很不赞成，他说看到报上的一些记述他的文章心里非常不安。不久之后，他特地为此给中宣部写了一封信，这信后来登在光明日报上。在他去世前两天，他又说，一定不要开追悼会，他不希望用眼泪和花圈来纪念他。就在这一天晚上，他一连心绞痛九次，大夫给他注射的罂粟硷的剂量达到六十毫克。虽说当时他实际上已经昏迷，但是他还对给他注射的护士说：“谢谢你！”第二天，他又挣扎过来了。他要他的亲属给他读报，这是惯例，不过这一回得在耳边大喊，以致不得不把房门紧闭，以免惊扰其他的病人。

孙冶方同志是一个肝癌患者，谁都知道这种病会给病人带来多大的痛苦，它实在是难以忍受的。但是一直到临终的时候，他从来不叹气，不呻吟，更没有流眼泪。多么坚强的人呵。大夫和护士都说，很少见过这样的病人。北京医院按照他的遗嘱，在他去世之后，对他的遗体进行了解剖，使大夫们大吃一惊的是，他的肝的左叶已经完全腐烂，象一堆渣子，连下刀子切片都不可能。右叶除还有鸡蛋那么大小的一块是完好的

外，其余有的烂了，有的长满肿瘤，而且已经扩散到肺的下半部。人们不难想象这会给病人带来多大的痛苦。但是孙冶方同志长期忍耐着，克制着，他不愿别人（不仅是亲人，战友，还包括大夫和护士）分担他的痛苦。他从哪里来的这种顽强精神？这使我想起那些遭受敌人严刑拷打，全身血肉模糊、视死如归的烈士们。

二月二十二日傍晚，当我离开病房，和这位亲爱的战友永远告别的时候，我想起了俄国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

“生命，如果跟时代的崇高的责任联系到一起，你就会感到它永垂不朽。”孙冶方同志从他还没有成年的时候一直到他离开人世这五十九年间，他是始终和我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紧紧拧在一起的。他是一个高尚圣洁的共产党员，是一个热爱祖国的志士，他对共产主义信念有着坚定不移的忠诚。就是这信念指引了和鼓舞了他度过他生命的整个历程。和我党我国无数为革命事业献身的先烈和英雄一样，他的生命是不朽的。

孙冶方经过长期的坎坷和艰苦的奋斗，终于见到了他最后的一个春天。这是一个他从未见过的、明朗而又充满着希望和活力的春天。让我们这些后死者也和他一样怀着坚定不移的信念，为我们亲爱的社会主义祖国创造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美好的春天。

哭 冶 方

冯 定

亮公冶方，先我而行，实在不该是这样的啊！

我们相识于二十年代黑暗的中国，为了寻求解放人类的道路走到一起来了。我们有着相似的遭遇，经历了严峻的历史的曲折。在这漫长的道路中，你始终那样纯洁、正直。不为命运所屈服，不为世俗的干扰、威胁而动摇对信念的追求。

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〇年间，我们受党的派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没有想到，在这传播马列主义火种的地方，却遭到了王明宗派家长制的统治；他把对支部工作提过意见的人，都以反党论处，自己却封为响当当的布尔什维克。你由于热情而豪放，思想活跃，结交甚广，竟被王明把持的支部局扣上搞“江浙同乡会”反党小集团的帽子，还险些儿戴上托派的罪名。王明路线一直到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才彻底得到清算，我们所受到的迫害也随着长达数十年之久而得到澄清。

“七七”芦沟桥事变，在中国大地燃遍了抗日的民族解放烽火。我们由白区地下党江苏省委输送到新四军。记得我们在华东局党校任课时，同志们都亲切的叫你“孙教员”。少奇同志的《答宋亮》，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写作流传的。这个时期，正是皖南事变之后，同志们掩埋好战友们的尸体，揩干了身上的血迹，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刘少奇同志化名胡服，日夜兼程由延安赶到江北指挥部，重建新四军军部，担任政委，陈

毅同志为代军长。新四军不但没有被打垮，反而又发展壮大，由六个支队发展为七个师的兵力，活跃在敌后，为取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做出贡献。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多么需要有成千上万的忠诚党的事业的干部去完成啊，华东局党校正担负着这样的重任，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面打仗，一面培训干部。

最是值得记忆的，一九四五年秋，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日本侵略军投降后，我们会师于江苏淮安，当时我们在邓子恢、张鼎丞同志领导的华中分局工作。在百忙的斗争中，你没有忘记学习，你对我说，老冯啊，赶快抓紧复习俄文，以便读更多的马列文献，加深理论研究工作。一九四九年春，渡江战役之后，我们会师于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身经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各代中外反动阶级的统治，千疮百孔，百废待兴，任务很繁重。可是你不顾紧张和压力，还要给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你的决心竟然实现了，你约我俩人合请了一位白俄老太太，跟她学俄文。我们每周两次，在早上上班以前，七点到八点到她的住处去上课。我在你的这种可贵的好学精神带动下，确实收到不少效益。一九五二年我写的那篇关于对中国资产阶级分析的文章，一方面是在上海的“三反”“五反”运动中取得的感性认识，另一方面就是在学习俄文的过程中，重温了马列的俄文文献所得到的启发。六十年代开始，我们已经闻到了阴谋家野心家康生、陈伯达等人的火药味，他们还在虎视眈眈地寻找着猎物哩。其实更早的导火线还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由于张春桥的资产阶级法权一文的发表，引起一种极左的论调笼罩着理论界。只要是与这种调子稍不相同的议论，都被视为异端。当时，我内心十分苦闷。可是，你却仍然处之泰然，发表着你的观点。我真敬佩你的精神，同时又为你担心

啊。一次，在中宣部召开的理论讨论会后，我亲眼看见康生拍着你的肩膀，笑嘻嘻的说，“冶方啊，你的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很好嘛，你要尽量都把它们发表出来啊”。可是过后我又听人说，康生在毛主席面前说：“苏联有个利别尔曼，可是中国还有一个比利别尔曼还利别尔曼的咧，那就是孙冶方。”你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的牺牲品啊！

一九六四年我们被抛出来示众了，康生、陈伯达等却踩着我们的肩膀更加“无产阶级化”了，成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最高荣誉的称谓者——“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

一九六四年冬天，我被“扫地出门”了。从北大校园里面赶到西校门外面的一个宿舍区。有一天我在过马路到校园里面接受批判时，猛抬头在北大西校门的围墙上看到贴着大幅标语“孙冶方大特务被逮捕了，大快人心”。这时，我的脑子嗡的一声，象是要炸开来一样。我想大叫一声“孙冶方是好人”，可是我什么声音也没有发出来，原来，我已经昏昏沉沉，在马路路上被自行车撞倒了。那样的岁月啊，你却坚强的闯过来了。

粉碎“四人帮”后，你是第一个来看我的客人。你在我那间小屋子里和我“密谈”了一天，主要是议论揭发康生的问题。当时，我的身体已经不济了，思想也没有你那么解放，许多事还“心有余悸”，不知怎么说才好。可是，你却始终那么明朗、坚定、无畏。

你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因为你的心灵始终是那么美好，与金子一样纯真，无瑕。你的一生又是坎坷的一生，因为美的东西总是要被丑的东西所忌恨所不容。象康生、陈伯达这样的历史小丑，他们最起码的动机至少是不允许有人超过他们的“理论权威”的宝座。所以要千方百计把你打下去。

你的遗言，就是你一生的起点。从我认识你的时候起，你

的精神就象你的遗言那样具有共产主义的风格。所谓共产主义的风格，它实质上就是具有批判一切旧世界的旧东西的精神。这点，你不但在学术上思想上做到了，就是在生活上也做到了。你在生活方式上，不讲究待遇。你几十年来一贯严格要求自己，不向组织上提什么要求。你在全国解放后，“文化大革命”前，始终住在两间一套的房子里，如果按照你的资历、级别待遇来看，你远远可以比你的现状过得更好些。

你的一生的遭迁，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走过的道路中带普遍性的问题。历史的经验，往往要经过无数次的曲折反复，才能被人们逐渐逐渐的认识。现在，如果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那么，也可以说是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经历的一个幸福的时期。因为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中，以及在中国革命中所处的地位、作用，他们的表现和作为，已经逐步被社会所承认，并且逐步做出了应有的客观评价，这样就为更好的发挥他们各自的作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就是知识分子最大的欣慰，精神上最高的奖赏。

你无愧于模范党员的称号。你不但尽了你自已一生应尽的责任，完成了你的历史使命。你的一生，还留下了丰富的值得大家学习的财富。保尔·柯察金提出的：一个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的课题，在你的一生中用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让我们还活着的人，都来参加回答这个人生的课题，丰富这个人生的课题吧！

亮公治方，你已经安息了，但是你的光辉事迹，将感召着更多的人来接替你的事业和志向，从这一点来说，你还活着，永远活着！